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 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袁 媛, 许学强, 薛德升

(中山大学 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 利用广州市 2005 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 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 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 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 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 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 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 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关键词: 新城市贫困; 地域类型; 分异机制; 转型时期; 广州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8)03-0672-11

1 导言

城市贫困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的一部分, 从芝加哥学派开始, 其分布特征、演变规律和形成机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传统研究用以收入为代表的经济指标来界定贫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在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大城市后工业转型和国家福利项目削减, 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加剧, 社会空间分异显著乃至极化^[1]。国外学术界开始关注新城市贫困 (New Urban poverty) 研究^[2], 新贫困阶层不仅在食物、收入等方面, 更在住房、教育、服务设施、社会活动参与等方面处于不利状况^[3]。单纯以经济指标界定的贫困概念已不能满足研究需要, “综合贫困” (Multiple Deprivation) 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应运而生, 这是在 70 年代人本主义、80 年代结构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空间评价及结构研究^[4]。研究不断完善综合贫困指标体系, 发展以地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5~8], 通过权重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计算综合贫困指数, 系统识别相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的地域分布与变化^[4, 8]; 并在不同空间层次探讨全球化下西方社会经济转型对城市综合贫困指数变化、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9~13]。但是研究多关注综合贫困的测度方法和分布结果, 综合测度的结果和贫困地域类型划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前者无法为后者提供充足的依据, 未能提供贫困地域类型分异的解释框架。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普遍低收入水平背景下, 城市贫困阶层以三无人员 (无经济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 为主体, 规模小、增长低。转型时期, 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深化带来下岗失业人员激增, 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户籍

收稿日期: 2007-06-25; 修订日期: 2007-12-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701049, 40701039);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37210-1131009)

作者简介: 袁媛 (1976-), 女, 浙江绍兴人, 博士, 讲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城市规划与设计。E-mail: yyuanah@163.com, yuanyuan@mail.sysu.edu.cn

制度改革带来大量农民进城市务工，城市内以下岗失业和农民工为主体的新贫困阶层涌现，且类型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4]。研究发轫于90年代初，地理学界在区域、大都市区、城市内部等不同空间层次分析了新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分布与演变^[15~21]，贫困人口住房问题^[21]、贫困人口聚居和低收入邻里类型与形成机制^[22~24]等研究，把户籍贫困地域定性划分为“下岗失业工人聚居区”和“内城衰退居住区”两大类^[20~22]。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收入为标准界定贫困和测度空间分布，宏观空间测度和微观地域类型研究脱节，单一的空间测度标准不能为地域类型划分提供数量基础，导致贫困地域以定性分类为主；微观贫困地域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不足，不能为改造规划提供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对宏观层面指标体系和微观社区调研数据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以广州市为对象，借鉴国外研究拓展贫困指标，采用国内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24~30]等方法，综合测度城市贫困空间、划分贫困地域类型，利用微观社区调查进一步论证宏观分析结果，并解析贫困地域特征分异的形成机制。

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①从广州市2005年民政统计年报和荔湾、越秀、海珠等分区^①2005年8月^②最低保障月度统计表，提取97个街道贫困人口总数和下岗、失业、无业、在职低收入者等分类数，各街道最低保障金支出额。其统计对象是有广州市户籍的人口，所以本文重点分析户籍人口贫困空间测度和地域分类。②五普中与住房、就业、人口年龄、教育水平等相关的数据。③问卷和访谈资料：根据地域分类，选取三个典型社区发放250份问卷^③，共回收有效问卷222份，涉及222个家庭约730人。问卷有效率88%，社区平均抽样率0.84%；在市和区民政局、三个社区所属街道和居委会与约30个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④采用城市规划的现状填图法，综合调研典型社区的土地利用、建筑质量和风貌、设施配置、公共空间等。问卷访谈和综合调查作为第一手资料，有效支持宏观空间分析的结论。

2.2 指标构建

新贫困空间综合测度指标（表1）包括：①贫困总量：城市贫困人口发生率，也称贫困人口指数（head-count index），表示城市人口中生活水平低于城市贫困线的人口比例。②贫困深度：指数PG^④表示一定范围内贫困者人均收入与贫困线的缺口。③贫困空间分布：贫困人口集聚比例和各类贫困人口区位商等。④住房条件：住房拥挤程度、住房设施配置低比例、住房支出低比例等。⑤经济状况：赡养、抚养人口比例、低收入行业和低端服务业比例等。⑥教育水平：低教育水平比例。

国内外社会区研究选择所有类别的正、负向指标，综合贫困是研究处于不利状况的人

①五普数据的空间单元是2000年的街道，五年中广州市调整了局部街道建制归属，为了与民政部门提供的2005年低保数据对应，本文把2000年区划换算到2005年初的区划上。
②社会救助申请和审核具有时间阶段性，民政部门按照每月情况统计，虽然个别街道由于特殊原因在某一个时期内救济人口较多，但绝大部分街道的情况相对稳定。因此月度数据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贫困空间的分布特征。
③采取非概率抽样中的雪球抽样法和偶遇抽样法，2006年1~3月在督导员的监督和协助下，由调查员问卷调查户主经济、就业、教育情况和家庭住房条件等。

④ $PG = \frac{1}{q} \sum_{i=1}^q (Z - Y_i)$ ，PG—贫困深度指数，q—贫困人口数，Z—贫困线， Y_i —贫困者的经济收入（ $Y_i < Z$ ）。

表 1 城市综合贫困指标和主因子特征根、解释贡献、荷载矩阵一览表

Tab 1 Indicators of urban multiple poverty and the eigenvalues, variances contribution rate and principal load value matrix of five key components

| 变量序号和含义 | 变量序号和含义 | |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 1. 贫困发生率 (%) | 0 882 | | | | |
| 2. 相对全市平均贫困深度的比值 | | 0 657 | | | |
| 3. 街道贫困人口占全市贫困人口比例 (%) | 0 785 | | | | |
| 4. 各街道贫困人口相对于全市贫困人口的区位商 | 0 882 | | | | |
| 5. 三无人员区位商 | | | | | |
| 6. 在职低收入者区位商 | | | | 0 65 | |
| 7. 退休人员区位商 | | | | | |
| 8. 失业人员区位商 | | | | 0 797 | |
| 9. 无业人员区位商 | | | | - 0 909 | |
| 10. 下岗人员区位商 | | | | | 0 603 |
| 11. 户均房间数 (间/ 户) | - 0 629 | | | | |
| 12.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人) | - 0 599 | - 0 576 | | | |
| 13. 与其他户合用厨房和无厨房的家庭比例 (%) | | | 0 842 | | |
| 14. 炊事燃料为煤炭、柴火的家庭比例 (%) | | | 0 873 | | |
| 15. 无热水设施和无洗澡设施的家庭比例 (%) | | - 0 402 | 0 817 | | |
| 16. 与其他户合用和无厕所的家庭比例 (%) | 0 498 | | 0 724 | | |
| 17. 没有饮用自来水的家庭比例 (%) | | | 0 587 | | |
| 18. 建构房款低于 5 万元家庭比例 (%) | | 0 772 | | | |
| 19. 租房款低于 50 元家庭比例 (%) | | 0 589 | | | - 0 51 |
| 20. 14 岁以下儿童比例 (%) | | | | | 0 724 |
| 21. 60 岁以上老人比例 (%) | | 0 684 | | | |
| 22. 工业 (采掘、制造、建筑业) 人员比例 (%) | | - 0 831 | | | |
| 23. 低端服务业 (批发零售、社会服务业) 人员比例 (%) | | 0 72 | | | |
| 24. 未受教育、扫盲班、小学人员比例 (%) | 0 696 | | | | |
| 主因子特征根 | 4 454 | 4 431 | 3 456 | 2 062 | 1 535 |
| 主因子贡献值 (%) | 18 557 | 18 461 | 14 398 | 8 592 | 6 397 |
| 主因子累计贡献值 (%) | 18 557 | 37 018 | 51 416 | 60 009 | 66 406 |

资料来源：根据指标体系，本研究计算结果；多数地理学研究以因子荷载绝对值大于 0.4 为选取标准，观察本研究的中因子荷载绝对值，当其大于 0.4 时，各变量在五个主因子中相对均匀分布，较少有变量缺失和重复。因此本研究界定大于 0.4 为重要指标。

群，仅选择负向指标，例如住房条件中选择表示拥挤、配套不足的指标，教育水平方面选择低教育水平的指标。社会区研究对所有空间对象进行聚类，本研究仅对综合得分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有综合贫困状况的街道进行聚类。因此本研究在指标选择和聚类对象上有别于常规的社会区研究。

3 转型期新城市贫困因子分析

选取广州市 97 个街道的 6 类 24 个指标，采用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筛选出特征根大于 1.5 的 5 个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达到 66.41%（表 2，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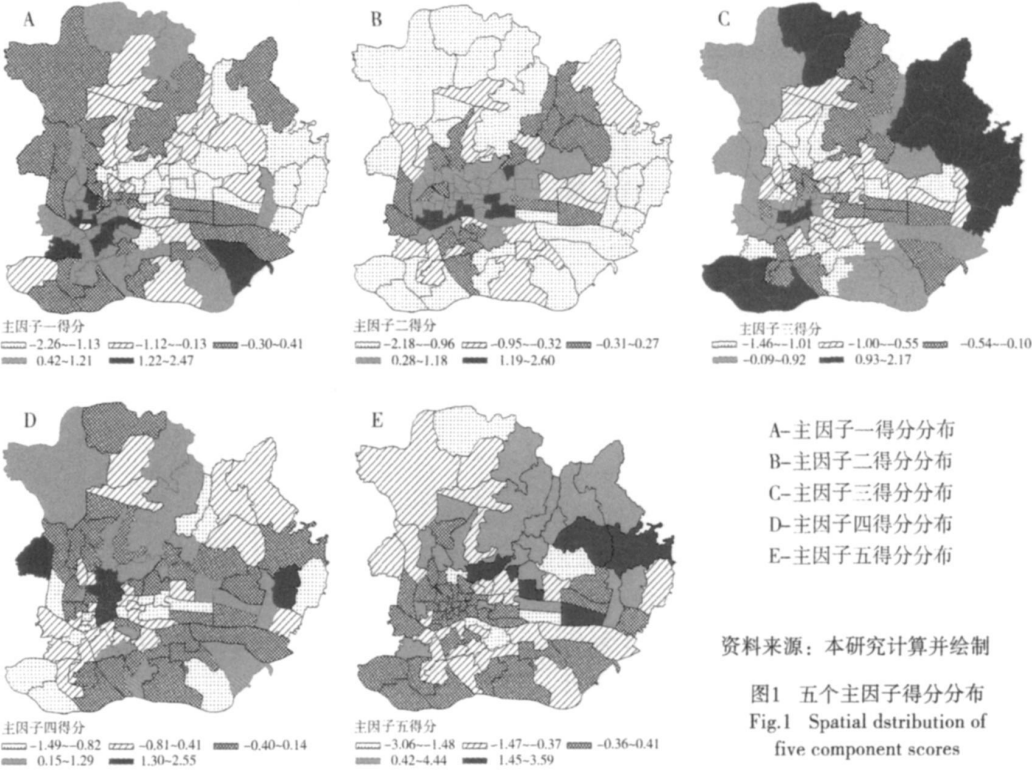
主因子一：绝对贫困，因子特征根为 4.454，方差贡献率为 18.557%，主要反映 7 个

表 2 新城市贫困地域聚类结果和主因子平均值

Tab 2 Cluster analysis result of new urban poverty areas and mean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s

| 类别 | 街道数 | 主因子一 | 主因子二 | 主因子三 | 主因子四 | 主因子五 |
|----|-----|---------|---------|---------|---------|-------|
| — | 10 | — 0.037 | — 0.526 | 0.800 | — 0.185 | 0.966 |
| 二 | 23 | 0.520 | 0.645 | — 0.273 | 0.380 | 0.100 |

资料来源：根据指标体系、本研究计算结果



变量信息，与贫困发生率、贫困集聚比例、贫困区位商、低教育水平等正相关，故命名为绝对贫困因子；与户均房间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负相关。因子得分较高的街道主要集中在内城核心区和靠近核心的外围区中部，也有少部分外围区东北部街道得分较高。

主因子二：职业类型，因子特征根为 4.431，方差贡献率为 18.461%，主要反映 8 个变量信息，与 60 岁以上人口、建构房款低于 5 万元、租房款低于 50 元、低端服务业人员、贫困深度正相关，与工业人员、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等指标负相关。与工人比例负相关且荷载绝对值最高（-0.831），与低端服务业人员比例正相关（0.72），故命名为职业类型因子。总体分布是从内向外得分逐渐降低，得分高的街道是老龄化程度高、低端服务业人员集中的内城核心区，得分低的是外围工人比例高的街道。

主因子三：住房设施，因子特征根为 3.456，方差贡献率为 14.398%，主要反映 5 个变量信息，与无独立厨房、无洁净能源、不饮自来水、无热水洗澡设施、无独立厕所正相关，故命名为住房设施因子。因子得分高的区域位于内城核心区大部分街道、部分位于城市外围区街道。

主因子四：就业状况，因子特征根为 2.062，方差贡献率为 8.592%，主要反映 3 个

变量信息,与在职低收入、失业人员正相关,与无业人员负相关,故命名为就业因子。得分高的区域为内城核心和邻近核心的越秀区主要街道、远离核心的外围街道等。

主因子五:家庭负担,因子特征根为 1.535,方差贡献率为 6.397%,主要反映 3 个变量信息,与 14 岁以下人口、下岗人员区位商正相关,与租房款低于 50 元比例负相关。14 岁以下人口荷载值最大 (0.724),故命名为家庭负担因子。主要分布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业企业分布较密集的外围区东部。

4 新贫困类型及分异机制

4.1 新城市贫困的地域类型

利用主因子得分和贡献率求得综合贫困得分,0 为平均水平,得分越高综合贫困情况越明显。97 个街道分为 5 个等级,第一、二等级 55 个街道得分低于 0;第三到五等级 42 个街道得分高于 0,有综合贫困状况。选用分层聚类法 (Hierarchical Cluster),离差平方和法 (Ward's Method) 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并画出树状聚类图。根据树状聚类图,反复实验,把 42 个街道划分三种贫困地域 (图 2)。

第一类: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10 个街道,主因子二平均值为负 (表 2),表明工人比例高、人均住房面积大、低端服务业人员比例低、贫困深度低。第五主因子平均值最高,表明家庭 14 岁以下抚养人口比例高。主要集中在天河的员村、车陂、凤凰、长兴和海珠的官洲等外围街道,是工业较集中分布区。天河区车陂街的广氮社区是典型代表,它是原广州市氮肥厂配套居住区,建于 1950 年代末,是一个小学、幼儿园、医院、电影院等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居住小区,绿化、治安环境都较理想,企业正常运作时有定期维护。与其他大中型国有企业配套居住区一样,10~15 年前是城市中最好的居住区之一。人均住房面积 (17.6m^2) 是三个社区中最大的 (表 3),最接近广州平均水平 (18.19m^2);虽然贫困发生率属于中间水平,但是贫困深度是三个社区中最低的;工人比例最高,低端服务业人员比例极低 (表 4)。

第二类: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23 个街道,主因子四平均值最大,平均值为正。表明在职低收入者、失业人员比例高,就业状况不理想。主因子一平均值为正且在三类地域中位居第二,表明贫困发生率高、集聚比例大,是就业不理想和经济贫困的典型地区。集中分布在西村、南华西、滨江等居住工业混杂的街道。海珠区滨江街的渔民新村是典型代表。1960~1965 年间广州市政府为解决水上居民陆地定居问题,兴建 15 处全国最早的渔民安居工程,滨江东路渔民新村是其中规模较大、布局完整的居住小区。随着环境污染和渔业资源枯竭的加剧,转型期大部分国有和集体渔业公司转制或破产,导致家庭失业情况严重。渔民新村相对远离繁华的市中心,低技术的临时再就业机会少,加上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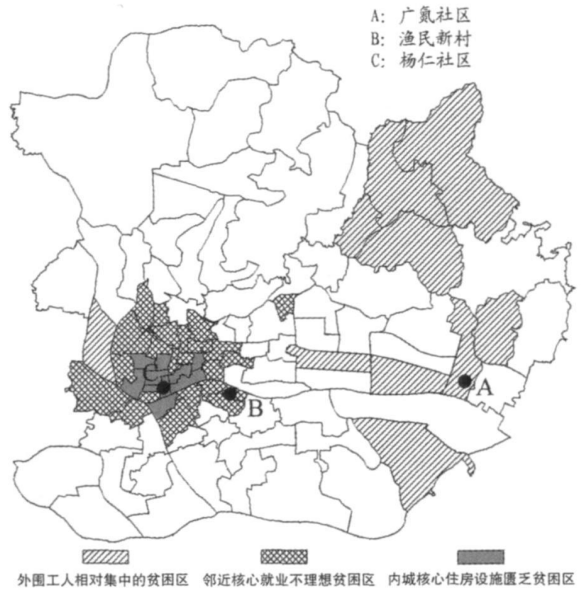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综合贫困地域类型和典型社区区位图

Fig 2 The types of urban composite poverty areas and the location of three communities

表 3 三种地域类型的代表社区基本特征一览表

| Tab 3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communiti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area | | | | |
|---|----------------------------|---------------|---------------|-------------|
| | | A: 广氮社区 | B: 渔民新村 | C: 杨仁社区 |
| 基本情况 | 社区区位 | 外围区 | 邻近核心区 | 内城核心区 |
| | 贫困地域类型 | 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 | 就业不理想贫困区 | 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 |
| | 社区典型性 | 破产大型国有企业配套 | 广州市最早的安居解困 | 老城混合居住区, 历史 |
| | | 居住区 | 工程之一 | 文化保护区 |
| | 主要建设时期 |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 |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 清末民初 |
| 贫困总量 | 人口密度 (万人/km ²) | 4 2 | 5. 3 | 12 2 |
| | 贫困发生率 ^a | 28 9 | 37. 2 | 24 1 |
| | 贫困深度指数(元/月) ^b | 115 | 185 | 150 |

注：数据来自问卷访谈和社区综合现状调研。

a：贫困发生率：人均月收入达不到广州市的绝对贫困线标准（330 元）的家庭占调查家庭总数的比例，这个比例远高于按照广州市分街道最低保障家庭数量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一方面目前社会救助审核标准严格、覆盖面相对较窄；另一方面不排除问卷对象对家庭收入情况有所隐瞒，但是不妨碍三个社区的比较。

b：贫困深度指数：绝对贫困家庭人均月度深度。

表 4 三种地域类型的代表社区住房和环境分异

| Tab 4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communiti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area | | | | |
|---|--------------------------|---------|---------|---------|
| | | A: 广氮社区 | B: 渔民新村 | C: 杨仁社区 |
| 基本条件 | 人均住房面积 (m ²) | 17. 6 | 10. 6 | 9. 8 |
| | 人均居住年限 (年) | 23. 99 | 32. 23 | 32. 44 |
| | 室内设施满意度 (%) | 35. 6 | 37. 2 | 22. 2 |
| 产权支出 | 住房产权率 (%) | 86. 7 | 16. 3 | 27. 78 |
| | 住房支出增加倍数 ^a | 0. 98 | 1. 74 | 2. 74 |
| 室外环境 | 室外环境满意度 (%) | 51. 1 | 48. 8 | 12. 9 |
| | 第三类建筑比例 (%) ^b | 26 | 23 | 46. 1 |
| | 绿地率 (%) | 25 | 14. 2 | 2 |

注：数据来自问卷访谈和社区综合现状调研。

a：2005 年家庭月均住房支出（房租/ 供房款、物业管理费等相关支出的总和）比 1995 年数据增加的倍数

b：调查中根据广州市规划局建筑质量标准把社区建筑分为三类，此处指质量最差的第三类建筑的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早期以渔业工作为主，再就业难度大。社区贫困总量和贫困深度指数均最高，当前下岗失业率最高。社区住房条件和设施配套虽然不如广氮社区，但是明显优于内城核心区，人均住房面积较大，室内外环境满意度也较高。

第三类：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9 个街道，主因子三平均值为正且最大，表明本区无独立厨房、无洁净能源、不饮自来水、无热水洗澡设施、无独立厕所比例高，住房内部设施匮乏，这直接影响到现代城市生活质量，也是不容忽视的综合贫困要素。主因子二正得分最高，表明低端服务业人员比例高。主要分布在内城核心的岭南、多宝、逢源、大新、人民等街道。荔湾区岭南街道的杨仁社区是典型代表。社区建于清末民初，是广州市布庄集中的专业化商业街，街后是从事布匹买卖的富裕商人居住区。解放后私人经济向国有和集体经济转变，居民职业结构和就业类型发生转变，由个体商人和私营业主转变为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服务业人员。同时政府通过接管、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私房、

接管无人私房等完成了私房公有化过程，以解决单位的职工居住问题。问卷统计约有 61.11% 的家庭在这一时期迁入，并不断搭建私房居住，造成人口和建筑密度高居不下。按照广州市分类标准，质量最差的第三类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 46.1%，人均住房面积、室内设施和室外环境的满意度、绿化率是三类社区中最低的（表 4），其中绿化率仅为 2%，远低于其他社区和广州市旧城区规划要求的平均值 25%。户主平均年龄 56 岁，退休和内退的约占到 26.8%，虽然他们退休金不高，但是比户主是下岗失业、无业的中年人家庭负担轻。贫困总量较低，当前下岗失业率和贫困深度位于三个社区中间水平。

4.2 三种地域类型演化及分异机制

现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企业改革深化及由此带来的下岗失业是催生新城市贫困的原因。城市贫困人口除了原体制下的三无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职业类型以工人、低端服务业为主^[12~14]。以国家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是新贫困阶层在特定空间集聚的宏观驱动因素^[19~22]；居住主体收入分化，中高收入主体居住流动，从而造成居住区内人口规模减少、人口构成变化是居住区演化为贫困地域的微观原因。

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贫困地域的特征分异呢？以广州为例的因子分析、典型社区分析显示，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者影响了社区的物质特征（建设基础和更新状况）和社会特征（人口构成、就业状况和家庭负担等），并导致转型时期贫困地域产生明显分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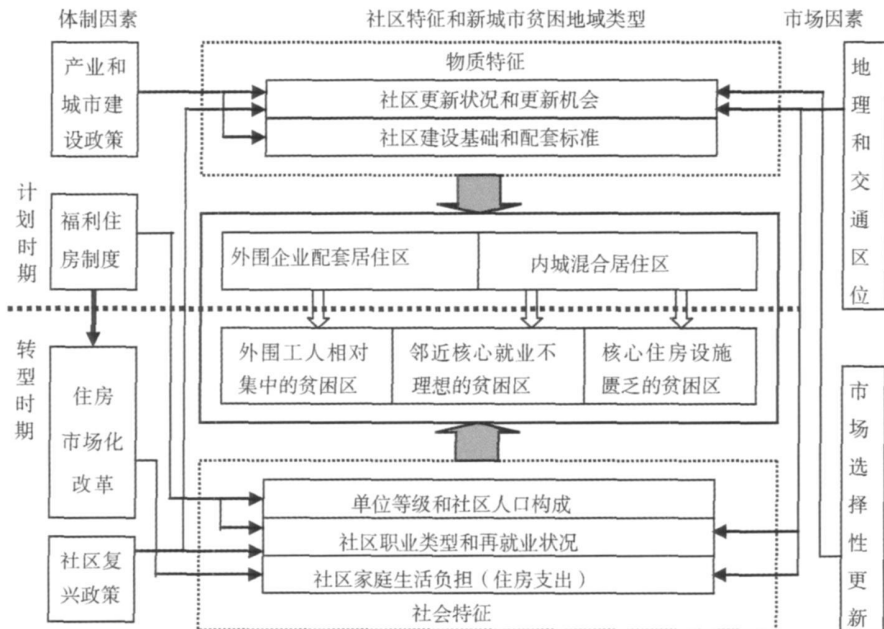


图 3 三种新城市贫困地域的分异机制

Fig. 3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three new poverty areas in transitional China

4.2.1 体制因素 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即单位或者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深刻影响了社区的人口构成、职业类型等社会特征。单位等级高、规模大的国有企业集中配套居住区，大多位于外围新建的工业区和邻近核心的工业区；单位等级低、规模小的集体企业，无力解决居住问题，职工只能租住政府房管部门管理的内城区公

房。因此形成了内城和外围居住区明显的社会特征差异：外围企业配套区人口构成单一，高等级单位同职业人群聚居；内城混合居住区形成了低等级单位人员（集体企业的工人和低端服务业人员）聚居。虽然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单位等级和职业类型有较大差异，为转型期贫困地域分化奠定了人口构成基础。

计划经济时期产业政策和对应的城市建设政策，影响了社区的建设标准和更新状况等物质特征。在生产性政策指导下，国家通过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向工业倾斜。为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建设重点在外围工业区和配套居住区，旧城更新被忽略。一方面在外围区大量兴建、在邻近核心的地区部分新建符合规划要求的居住区，室内外配套全、居住环境好；企业担负居住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定期维护更新物质环境。另一方面内城核心区建设标准低下的物质环境，疏于维护管理而日益衰败。产业和建设政策显著影响了建设投入和建设活动，是转型时期贫困地域物质环境分化的重要作用因素。

转型时期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影响了社区家庭负担等社会特征。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公共住房卖给长期住户，而公房租金日益与市场接轨。在贫困和低收入家庭食物、衣物等日常消费总量差别不大时，住房租金支出成为生活支出的重要部分^[21]。虽然改革改善了城市居民的总体住房条件，但是住房条件和单位等级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外围大中型国有企业职工在住房改革中拥有了配套较为齐全的住房产权，住房支出仅是维护管理费用，家庭住房负担相对较轻。而内城的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大多仍然租住公房或购得条件较差的住房，不论房租还是维护费均日益增长，住房支出负担相对较重。以广氮社区为例，住房产权率达 86.7%，远高于其他社区和广州市平均水平（74%）；过去 10 年里家庭平均住房支出增加倍数为 0.98，家庭住房支出的负担轻于其他两类社区。因此家庭住房支出和生活负担的差异加剧了贫困地域的社会特征分化。

转型时期社区复兴政策，深刻影响了社区的社会特征和物质特征。政府对不同等级单位社区复兴的重视程度不同，体现在再就业导向和物质环境更新两个方面。外围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旦出现破产或减员，来自部门的接管、帮扶和来自不同级政府的解困措施要多于内城的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广氮社区为例，2000 年广州氮肥厂因资不抵债和全面亏损而破产，是全国第一家关闭的中型以上氮肥厂，市政府在职工安置、物业接管、再就业培训等方面都给予高度重视。社区隶属的车陂街道代表区政府一直努力协助职工再就业，多次组织培训和推荐下岗职工，约 90% 的访谈家庭都得到过街道的推荐，至少有一半仍在从事推荐的职业。因此社区贫困总量相对较低，贫困深度和当前下岗失业率明显低于（再就业率高于）其他类型社区。而集体渔业公司破产职工聚居的渔民新村，则较少有再就业培训和推荐。广州市政府从 2003 年开始指定设计部门为广氮社区编制整治规划，并在政府主导下定期实施更新；而市政府直到 2006 年才启动内城部分衰退社区的整治规划，杨仁社区至今仍在等候名单中。由单位等级差异带来的社区复兴政策差异，将进一步固化贫困地域的特征分化。

4.2.2 市场因素 市场选择性内城更新，影响了社区更新状况和更新机会。转型时期，政府为吸引投资促进开发，往往给房地产商更多的自主权，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房地产商会有选择地投资项目。内城核心区人口密度高、拆迁安置成本高、保护要求高、产权复杂，在市场化背景下往往得不到更新的机会。以杨仁社区为例，广州市政府早在 1997 年就将其挂牌招标，虽然地处商业街的黄金地段，10 年间没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来投标。一方面人口和建设密度大，拆迁费用高，还需为社区内原有小学预留用地，开发利润低；另一方

面社区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 现状综合调研显示 42.62% 的建筑较好地保留了广州西关传统建筑风格, 广州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对新建和整修建筑的风格、高度、色彩等有严格要求, 致使新开发建设难度高。

社区自身地理和交通区位, 影响了社区人口再就业和家庭负担等社会特征。市场经济背景下, 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好的社区, 家庭可以借助区位优势适当缓解贫困状况。居住区位比邻商业繁华的街市, 给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较多无高技术要求的低端服务业再就业机会。以杨仁社区为例, 访谈发现下岗失业家庭大多在周边的快餐店、零售或批发商店得到配送、保洁等工作, 虽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 收入微薄, 却能够缓解生活困难, 降低当前下岗失业率(表 5)。邻近核心的地区相对远离繁华的市中心, 低技术的临时再就业机会少于、再就业交通成本高于核心的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居住主体自身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于大中型专业化国有企业职工, 再就业的难度大于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

表 5 三种地域类型的代表社区经济和文化差异
Tab 5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f three communities

| | | A: 广氮社区 | B: 渔民新村 | C: 杨仁社区 |
|------|---------------------------|---------|---------|---------|
| 经济环境 | 赡养和抚养比例 (%) | 28.57 | 26.27 | 25 |
| 户主就业 | 当前下岗和失业率 (%) ^a | 20.8 | 30.1 | 27.8 |
| | 离退休比例 (%) | 23.74 | 18.45 | 26.79 |
| 户主职业 | 工人比例 (%) | 77.3 | 68.5 | 58.1 |
| | 低端服务业比例 (%) | 4.4 | 18.5 | 23.3 |
| | 其他比例 (%) | 18.3 | 13.0 | 18.6 |
| 户主单位 | 国有企业比例 (%) | 91.1 | 34.9 | 33.3 |
| | 集体企业比例 (%) | 1.2 | 27.9 | 20.4 |
| | 其他比例 (%) | 7.7 | 37.2 | 46.3 |
| 教育水平 | 初中以下比例 (%) | 26.67 | 37.21 | 27.88 |

注: 数据来自问卷访谈和社区综合现状调研。
a: 当前下岗失业率: 是指扣除目前再就业后剩下的下岗和失业户主占总调查家庭的比例。

5 结论与讨论

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地域类型划分为三种, 其中“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与已有研究的“下岗失业工人聚居区”^[21~23]相对应; 根据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把已有研究界定的“内城衰退居住区”^[21~23]细化为“就业不理想”和“住房设施匮乏”两类贫困区, 拓展了我国城市户籍人口贫困地域类型划分研究, 更清晰解析了内城复杂的居住地域分异特征和面临的问题。

对广州三种贫困地域分异的机制研究表明, 在计划和转型两个历史时期, 体制和市场因素共同起作用, 但前面的影响更加明显。计划经济时期的住房供应制度奠定了地域的人口构成和职业类型特征, 产业和城市建设政策奠定了地域的建设和更新基础, 是贫困地域分异的源头。计划时期的体制因素, 在转型期仍然顽强地显现出来, 并通过住房市场化改革和社区复兴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地域的特征分异。研究在宏观空间分析、类型划分和微观社区调研基础上, 为综合贫困空间测度和类型划分建立有机联系; 通过总结我国城市户籍人口贫困地域分异机制, 拓展了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贫困理论和实证研究。

建议针对新城市贫困地域特征, 区别制定缓解贫困、改善居住的公共政策, 例如内城

核心区政府合理引导内城更新, 强调设施配置和环境更新; 邻近核心的地区增强再就业引导力度, 包括增加再就业培训、降低再就业成本等; 远离核心的外围地区强调与不同类型社区融合, 增强社区的抗干扰能力和多元化, 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城市普查数据和民政数据均以户籍人口为主, 本研究仅探讨了广州市户籍人口贫困地域, 尚未能解析全部常住人口的贫困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如何获取相关数据对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贫困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是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下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

- [1] Marcuse P R, Van Kempen Of States and Cities: The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 Mingione E The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3, 17: 324~ 326
- [3] Townsend P Depriv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87, 16: 125~ 146
- [4] Pacione M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urban Geography. Urban Geography, 2003, 24(3): 314~ 339
- [5] Knox P L, Pinch S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 [6] Noble M, Wright G, Smith George, *et al.* Measuring multiple deprivation at the small-area leve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 169~ 185
- [7] Kearns A, Gibb Kenneth, Mackay Daniel Area deprivation in Scotland: A new assessment. Urban Studies, 2000, 37: 1535~ 1559
- [8] Pacione M. 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Routledge, 2001
- [9] Langlois A, Kitchen P. Identifying and measuring dimensions of urban deprivation in Montreal: An analysis of the 1996 census data. Urban Studies, 2001, 38(1): 119~ 139
- [10] Broadway M J, Jesty G. Are Canadian inner cities becoming more dissimilar? An analysis of urban deprivation indicators. Urban Studies, 1998, 35(9): 1423~ 1438
- [11] Noble M, *et al.* The provincial 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for South Africa 2001. <http://www.statssa.gov.za/census01/html/C2001Deprivation.asp>
- [12] Fahmy E, Gordon D Mapping deprivation in the south west, 2002 http://www.bris.ac.uk/poverty/Regional%20poverty_files/swpho/SWPHO.pdf
- [13] Haller B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weden and Great Britain. Acta Sociologica, 1996, 39: 141~ 169
- [14] 袁媛, 薛德升, 许学强. 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研究述评. 人文地理, 2006, 21(1): 93~ 99
- [15] 马清裕, 陈田, 牛亚菲, 等. 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其解困对策. 地理研究, 1999, 18(4): 400~ 406
- [16] 陈果, 顾朝林, 吴缚龙.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地理科学, 2004, 24(05): 542~ 548
- [17] 吕露光.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贫困人口分布状况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04, 28(6): 74~ 77
- [18] Wu F. Urban poverty and marginaliz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4, 28(2): 401~ 423
- [19] 袁媛, 薛德升, 许学强. 转型时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贫困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 热带地理, 2006, 26(3): 248~ 253
- [20] 刘玉亭.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1] Wang Y P. Urban poverty,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Routledge, 2004
- [22] Yuting Liu, Wu F. Urban poverty neighborhoods: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under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Geoforum, 2006, 37: 610~ 626
- [23] 刘玉亭, 吴缚龙, 何深静, 等. 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 以南京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06, 25(6): 1073~ 1082
- [24] 张高攀. 城市“贫困聚居”现象分析及其对策探讨——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规划, 2006, 30(1): 40~ 46
- [25] 许学强, 胡华颖.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5~ 399

- [26] 郑静, 许学强.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 地理研究, 1995, 14(2): 15~ 26
- [27] 顾朝林, 王法辉, 刘贵利.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3, 58(6): 917~ 926
- [28] 冯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 2000).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 483
- [29]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 211
- [30] 周春山, 刘洋, 朱红.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46~ 1056

Spatial types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new urban poverty of Guangzhou c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YUAN Yuan, XU Xue-qiang, XUE De-she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accelerated reform of state and collective-owned enterprises since the mid-1990s, urban poverty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ics, but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on spatial measurement of multiple poverty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types of urban poverty areas. On the brief review of the studies and index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n western counties, this paper firstly highlights the expansion of measurement indexes of urban poverty from economic facet to multiple facets including housing, education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etc.

Taking Guangzhou as a case, using the MLSP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Programme) recipients data and fifth census data, the paper summarizes five key factors of multiple poverty and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n the level of sub-districts by the method of factor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spatial measurement, the paper classifies 42 sub-districts which have higher scores than the average score into three types by the method of cluster analysis. Three types of urban poverty areas are identified: outer concentrated workers' area, outer concentrated unemployment area of inner city, and dilapidated core with poor facilities of inner city. Then the authors did questionnaire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 three typical communities representing three types of poverty areas. The statistics further proved the analytic outcome on sub-districts level.

Concerning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on of three types of new urban poverty areas, it is the outcome of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factors in planned and transitional period. Though market-oriented factors affect the discrepancy, the paper argues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re most important. The socialist housing provision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policy in planned economy is the basis of difference of three types. The housing reform policy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ty are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location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the selected gentrification also influenc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hys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reas.

Key words: new urban poverty; spatial types;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transitional period; Guangzhou